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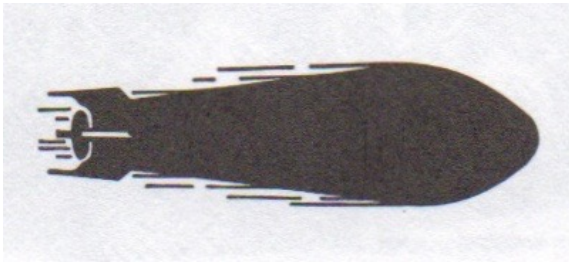
与沃德·丘吉尔《和平主义之病》一书商榷

治愈

乔治·莱基著

之劍





当暴力
遭遇
非暴力，
谁会胜出？



治愈之剑

——与沃德·丘吉尔《和平主义之病——对北美武装斗争作用的反思》商榷

★ 乔治·莱基 著

★ 美国 费城
变革培训机构

★ 中国权利在行动 翻译

变革培训机构地址：
1501 Cherry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02-1477
U.S.A.
电话：+1215-241-7035
网址：www.TrainingForChange.org

沃德·丘吉尔《和平主义之病——对北美武装斗争作用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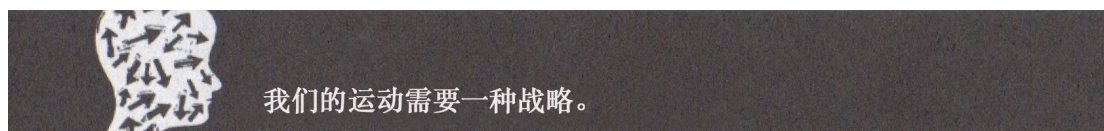
加拿大，温尼伯市，阿尔贝塔瑞出版社，1998年，176页



沃德·丘吉尔的《和平主义之病——对北美武装斗争作用的反思》一书在新兴活动家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活动家活跃在华盛顿特区、费城、洛杉矶、西雅图战役¹，以及其他争取经济、社会公正的第一线，他们常常占据媒体的头条。沃德·丘吉尔是一位美洲印地安权利运动和其他运动的活动家，是一位高产作家和科罗拉多大学民族学教授。

当我和一些新兴活动家交谈之后，我给沃德·丘吉尔的这本书写了一个书评。2001年2月，我还受邀到科罗拉多州波尔德斯市与沃德·丘吉尔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现场观众可以发现，两位观点截然不同的老牌活动家之间也可以像朋友一样交流，并且发现双方观点的共同之处。

沃德·丘吉尔和我都希望找到消除不公和压迫的力量，同时还能治愈人们的创伤。马丁·路德·金相信，非暴力行动是“治愈之剑”，因此，我借用此句作为本文的标题。我首先会说明我和沃德·丘吉尔相同的观点，然后就他书中的另一些观点提出商榷。



我同意沃德·丘吉尔哪些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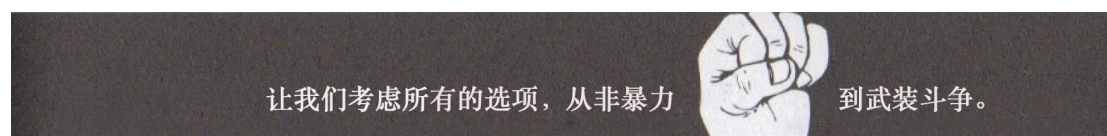
我们都同意世界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剥削，并且愈演愈烈。我们都亲身经历了劳工阶层遭受的压迫。沃德·丘吉尔的土著身份和我的同性恋身份使我们更加体会到这种压迫的严苛和痛苦。我们对资本主义、自上而下的专制统治、杀人的美帝国主义都不抱幻想。

在我们研究过去半个世纪社会运动的历程时，我们都深感失望，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所声称的成功并没有那么深远。尽管在平等居住权、投票权和反歧视等方面民权运动取得了具体的成效，但种族主义在美国依然猖獗。核电巨头正在向全世界推销危险的核电站，尽管反核能运动在阻止美国建设新的核电站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核废料仍然在毒害这里的人民。尽管反越战运动的成功对美国政府的权力做出了一定的限制，但美帝国主义的海外军事干预仍然是今天全球的头号杀手。

¹ 1999年11月30日，WTO在华盛顿州首府西雅图举办千禧年世界贸易大会。反对全球化的抗议者在会议当天包围了会场和与会者居住的宾馆。据估计，抗议者多达40,000人，超过美国之前所有的反全球化运动。

当我与沃德·丘吉尔一样对这些社会现实和其他社会运动并没有取得更多成效感到失望时，与他不同的是，我仍然为已经取得的成效庆贺！我相信活动家可以通过反思和战略调整使运动不断向前推进。

我同意和平主义者有时过于踌躇满志和自以为是，他们不愿对具体的行动计划进行务实的探讨，只愿意进行道德评价，因而妨碍了运动获得更多选择的可能性。



沃德·丘吉尔指出，许多非暴力活动人士真心希望社会变革，他们甘愿承担风险，甚至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同时，也有很多非暴力活动人士对社会变革并不真诚，他们所从事的行动和所冒的风险只不过是表达一种姿态。我同意这些批评意见。

我也同意不能在把暴力和非暴力两种斗争方法放在一起权衡利弊之前，就把暴力斗争排除在外，因为那无助于制定战略。我在波尔德市与沃德·丘吉尔的辩论中曾经强调，我们的运动最迫切需要的就是长期战略和愿景。

我同意沃德·丘吉尔提出的“最有效的斗争就是最好的斗争”这一观点。什么样的斗争是最有效的呢？那就是付出最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公正，最有利于建设一个新社会。

我的这篇文章主要是从有效性和现实性两个方面回应沃德·丘吉尔的观点。我会在

有效性方面挑战他做出的一些假设，我会在权力的现实性方面挑战他对历史的一些解读。我还会例举一些值得借鉴的运动，这些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非暴力斗争比暴力斗争更加有效。

社会变革需要战略

沃德·丘吉尔在他的《和平主义病——对北美武装斗争作用的反思》一书中写道，他的目标是揭露和平主义，挑战其道德上的虚伪。他说他并不打算给出一个美国暴力斗争的战略，那不是本书的任务。

“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在一件事上处于相同的困境——两者都没有给美国一个明确的战略。在暴力斗争的倡导者和非暴力斗争的倡导者中，战略都有极大的欠缺。



美国缺乏暴力革命的实用战略。

最近在美国，社会主义活动家和作家马丁·奥本·海默与其他活动家有一次聚会，大家在一起严肃的讨论美国1960年代晚期的“革命”——马丁·奥本·海默发现，这些倡导暴力斗争的活动家拿不出任何战略。为此，他专门写了《城市游击队》一书，探讨暴力斗争的两种不同的战略并预测两种战略可能造成的结果。我认为，这两种暴力斗争战略都会导致民主和公正的灾难性后果。

对于不止想自我表达，更想真正改变现状的活动家来说，建立一套在暴力斗争中切实可行的战略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但现实是，没有这种战略存在。

我们如何发展战略，受到我们对世界如何运行的假设的影响。因此，将各种假设进行比较是有益的。无论多少种假设，都是为创建战略的艰苦工作而准备的。很多新的活动家来自大学，他们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做这项艰苦的工作，因此，我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这项挑战！

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和平主义是不言自明的吗？

沃德·丘吉尔在他的书中指出，和平主义是非暴力政治行动的意识形态，这对于主流的北美进步主义者是不言自明的。如果他的意思是大多数进步主义者在设计他们国家的变革方案时，都必然会考虑使用非暴力行动的话，我不同意这一观点。



**非暴力行动受到普通运用，
很大程度上因为它是行之有效的。**

几年前我被一个全国性组织的领导人请到华盛顿特区，参加一个帮助穷人和劳工阶层的大型会议。他们的运动面临失败，希望我能帮助他们设计一套非暴力斗争的方案。我向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反抗的动力是什么？

他们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他们告诉我，有几个激进的团体因为幻想破灭离开了该组织。短期内，他们已经没有反抗的动力。我说：“当前，你们首先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不可能在缺乏反抗动力的情况下发起一个强有力的非暴力直接行动。你们过去的行动一直是传统的游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它变成一个非暴力行动！”

这是许多案例中的一个。绝大多数北美进步主义领袖强调认同传统的政治途径，比如选举、游说、起诉、请愿、写公开信、进行公共宣传，以及类似的方法，他们并不相信非暴力行动。现实确实如此！

马丁·路德·金在第一次被推举为民权领袖时，一些原有的黑人组织反对他和他倡导的非暴力战术，他们认为，诉讼和游说可以起作用。即使诞生于19世纪的腥风血雨之中的劳工运动也支持传统的方法，而不是开展非暴力罢工。

我和沃德·丘吉尔之间存在不同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在使用相同的词汇描述不同的事情。在沃德·丘吉尔的书中，他用“和平主义”、“非暴力”、“非暴力革命”这些词描述同一件事，虽然这些词的含义并不相同。

非暴力，或（我习惯称为）非暴力行动，大多数时候被草根团体使用，特别是当人们需要通过体制外力量实现某一个目标的时候使用。游行、静坐、占领、罢工、抵制，我们在报纸上每天都能读到这些非暴力行动的方法。人们之所以使用这些方法，是因为它比其他传统的方法更行之有效。但全国性的专业反对组织还没有建立起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思维，正如同我指出的那样，大多数情况下是草根活动人士在使用它。比如拯救森林，为无家可归者争取庇护所，改变与艾滋病相关的政策，阻止企业从血汗工厂采购产品等等。



**非暴力并不等同于和平主义，
很多非暴力行动者也不等同于和平主义者。**

在美国，有色人种使用非暴力行动多于白人，年轻人使用多于年长者。非暴力行动不仅在以社群为基础的劳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同性恋、残疾者、环境保护、学生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和平主义”是一种理念，一种在精神上持守的，不以伤害他人为代价实现目标的信仰体系。和平主义者相信，好的目的不应以杀戮为代价。同样，和平主义者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也认为，好的结果必须经由好的方法而达成，就像一块好蛋糕需要好原料。和平主义者相信，无论是精神还是意识层面，都应以“用你希望看到的方式去生活”。最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是印度的莫罕达斯·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和“联合农场”组织的创始人凯撒·查维斯。

美国绝大多数从事非暴力行动的人并不是和平主义者。马丁·路德·金博士很清楚，许多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他领导的民权运动的非裔美国人并不信仰和平主义，他们仅仅出于实用的目的而采取非暴力行动。同时，很多和平主义者几乎从不参与非暴力行动，他们很少走上街头抗议、罢工或采取公民不服从行动。因此，沃德·丘吉尔将“和平主义”和“非暴力行动”混为一谈，在分类上是混乱的。

将“非暴力行动”、“和平主义”与“非暴力革命”的概念混为一谈更是扰乱视听。最典型的非暴

力革命的观点来自《非暴力革命宣言》²一文，它比大多数非暴力行动者、和平主义者更加激进，它主张结束腐朽的资本家主义，结束国家-政府体制，结束对环境的破坏。抵制爱国主义、种族主义，以及任何形式的社会压迫。它表达了这样的愿景——一种和现实差异非常大的社会秩序——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企业是民主的，人类与地球是和谐的。这一观点比马列主义更激进，它汲取了左派失败的经验，为未来指出了一条新鲜而有创意的道路。

非暴力行动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地
抵抗不公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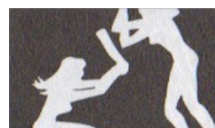
犹太人是因使用了非暴力行动而被迫害的吗？

沃德·丘吉尔最过分和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混乱言辞是其对犹太人大屠杀经历的描述。首先，他夸大了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的逆来顺受。事实是，有许多犹太人对纳粹进行了反抗，我们应该向那些勇敢的犹太人表达敬意。其次，他说那些被迫沉默，或是否认迫害正在发生的犹太人是在从事非暴力行动！他说：“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可以用来评估非暴力运动对抗国家机器时取得成功的案例，至少在规模和残酷程度上没有可以和纳粹大屠杀相比的成功案例。研究表明，越逆来顺受，受到的迫害就越深重。”

我们所有从事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活动家都了解积极行动与逆来顺受之间的差别。参加任何罢工工人之间的讨论，你都会听到积极行动和逆来顺受之间的差别；加入任何社区讨论如何反对一个新的有毒垃圾场的建设，你都会听到积极行动和逆来顺受之间的差别。

1930年代，甘地担心纳粹德国的发展趋势，于是写信给柏林的一位犹太教拉比领袖，建议他组织和动员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和盟友共同抵抗纳粹的威胁。无论甘地看到哪里存在不公正的局势，他都主张采用积极的非暴力抵抗行动。事实上，甘地是如此反对逆来顺受，他认为，如果看到一个恶行正在发生，而我们只能在被动和暴力之间选择，那么我们应该选择暴力。当然，甘地相信现实中有不止两个选项，我们可以创造有影响力的非暴力行动并加以实施。

非暴力运动有时会经历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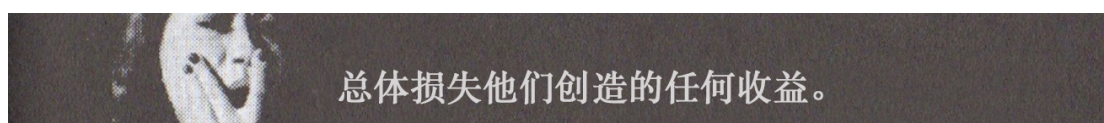
非暴力行动能否成功，取决于对手暴力威胁的程度吗？

沃德·丘吉尔认为，印度反抗英国殖民者的非暴力斗争和美国民权运动的成功均依赖

² 由本文作者撰写，1972年新社会运动出版社出版。

于暴力。他相信，英国军队在经历了二战之后，已经疲惫不堪，无法再对印度保持殖民统治，因此放弃了暴力镇压——是战争使独立成为可能。但是，怎么解释英国在印度1948年独立后继续保有其他的殖民地呢？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是，英国在1950年代通过轰炸村庄，对肯尼亚的毛族叛乱进行了无情的镇压。英国仍然具有对于要求独立的武装斗争进行军事打击的能力，却不能对通过非暴力斗争争取独立的地区继续统治。因此，不是战争使印度独立成为可能，是印度人民的不合作使印度独立成为可能。

我用曲线图来说明美国民权斗争的有效性：从1955年到1965年间，曲线在不断地上升。成功的行动包括：反抗巴士上的种族隔离（蒙格马利自由搭车运动）、抗议餐厅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里的种族隔离（静坐、静站、静游，伯明翰运动和1964年民权行动等）、争取黑人在南方州的投票权（密西西比之夏、塞尔马行军、1965年投票权利行动等）。



1965年开始，群众运动成为民权运动的主要形式，曲线从这时开始下降。此后数年，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南方州也有黑人当选了政府官员，但那是早年的工作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从1965年开始，北方城市如纽瓦克、费城、底特律、沃茨发生了一系列暴乱，“自卫与公平执事”³和黑豹党⁴崛起。到1968年，活动家即使提出非政治性法案，比如，为控制城区鼠患提供资金的法案也在众议院遭到公开耻笑。正是民权运动放弃了在大规模群众运动中坚持非暴力原则之后，运动开始失去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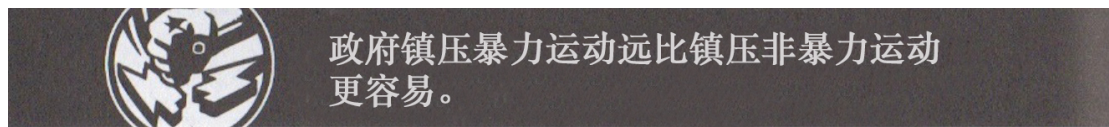
只要政府愿意，它就能够将任何非暴力运动镇压下去吗？

2000年，塞尔维亚的军事统治被推翻，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被非暴力运动赶下台。1986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菲律宾的独裁者马科斯身上。1989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东德、匈牙利、捷克和波兰的独裁者身上。伊朗统治者巴列维拥有一支世界前十强的军队和最残忍的秘密警察部队，但在1979年，他还是被非暴力运动推翻了。我还可以继续举出很多例子。

³ 一个主张武力自卫的非裔美国人平权运动组织，活跃于1960年代的美国南方，主要对抗3K党和受3K党影响的政府和民兵。该组织于1965年1月正式成立，总部设在路易斯安那州琼斯伯勒，创始人是欧内斯特·托马斯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柯克帕特里克。该组织前身是“自卫与公正俱乐部”。“自卫与公正”是当时该组织领导人外号的组合，“执事”一词是希望3K党误认为他们是一个普通的宗教团体。

⁴ 成立于1966年，是一个黑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组织。该组织支持毛泽东主义、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法西斯、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他们的核心主张是组建公民武装巡逻队，监督和阻止警察的不法行为。

是什么令沃德·丘吉尔认为活动家没有力量？是因为他低估了人民的力量，这是我们主要的力量源泉。草根活动人士无法比拼政府的财力，我们也无法比拼政府的暴力。我们拥有的潜在的力量是人民的力量，低估人民的力量将会走向绝望。



沃德·丘吉尔的基本假设是：暴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这是大多数右翼、左翼和中间人士共有的传统认知，就如同人们一度认为地球是平的一样。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活动家经常会从自身经历中发现暴力的弱点。我记得曾经在一次联合矿工工会的培训中和一位领导人谈话，他回忆起自己十几岁时在煤矿工作的时光：“我告诉你，我喜欢过去的好时光，那时候我们罢工可以砸东西、打人，可以开枪射击——你知道，我们有很多枪支，而且我们知道如何使用它们。”他叹息道：“这些现在没有用啦。要向前看！教我们怎样开始非暴力斗争！”

我称之为“将非暴力行动作为最后的手段”。

一个典型案例是1944年的萨尔瓦多，当企图推翻独裁者埃尔南德斯·马丁内兹的武装起义失败后，政府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于是，学生发起了非暴力反抗。非暴力之所以成为反抗的主要方式是因为暴力斗争的失败。最终，学生用非暴力行动成功推翻了埃尔南德斯·马丁内兹——“人民的力量”在暴力失败的地方获得了成功。萨尔瓦多的胜利也影响了其邻国危地马拉的学生，他们也发起了非暴力反抗，并最终推翻了“加勒比地区铁腕独裁者”乔治·乌维科。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运动都放弃了武装斗争，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是这一现象最有名的例子。1980年代早期，南非国民大会党意识到，其反对种族隔离的武装斗争失败了，他们甚至无法大规模地动员城市那些渴望为争取自由行动的人们的参与。因此，尽管没有公开宣布放弃武装斗争，但他们实际上转入了非暴力斗争：抵制、罢工、集会等各种方式。尽管他们的对手拥有一支强大而残暴，并热衷于积极镇压的警察军队，但最终仍然不得不结束了种族隔离，



当运动具有权衡利弊的能力时，就会从自身经验中成长：远离暴力，远离打砸抢。以波兰“团

结工会”为例，该运动是从共产军事独裁统治下争取自由的工人运动。在早期的斗争中，“团结工会”在罢工和集会中掺杂了打砸抢的行动。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认识到，打砸抢只会加剧独裁者的镇压，减少可能争取到的盟友。因此，他们决定放弃暴力，扩大运动，直至取得胜利。当然，拥有军事力量的国家政权想镇压他们，但是做不到，因为人民的力量比军队的力量更强大。

以上事实有力的反击了“暴力才行之有效”的传统认知。因此，我对为什么仍然有人坚持暴力斗争感到困惑。美国“学生非暴力合作委员会”南方州成员伯纳德·拉斐特用一个比喻向我解释，他说，社会就如同一栋房子，基础是人民的合作或服从，屋顶是国家及其镇压装置。他问我如果抽掉地基，这栋房子会怎样？他继续问：“如果屋顶放上更多的武器、坦克，更多的技术装备，抽掉房子的地基会发生什么？”

我确信：如果地基垮了，再多的武器也无法阻止屋顶坍塌。

测试上述理论的方法是看一看伊朗统治者巴列维垮掉的例子。巴列维不但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还有一支冷酷无情的秘密警察队伍，而且还有美国政府的支持。反对派领袖选择用一种完全的非暴力战略却取得了成功。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沃德·丘吉尔的书里对此可能性未做任何解释。按照他的理论，这不可能发生，因为国家军事力量会镇压非暴力运动。



当运动转向暴力，对政府通常是好消息。

伊朗统治者巴列维这栋“房子”的基础是人民的服从。当基础被抽离，房子就塌了。

对于今天的活动人士，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政治统治的基础是人民的服从，而不是暴力。人民的力量比暴力更强大。我们越快掌握这些知识，独裁统治就越快倒台。

暴力适用于自卫吗？

美国人通常认为，当面对国家暴力时，社区组织和人民应该使用武器进行自卫。在我知道的一些案例中，虽然个体使用武力自卫可能产生效果，但是组织使用武力自卫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美国最著名的案例是黑豹党，他们组织社区参选，为贫穷孩子提供免费早餐，并采用武装自卫的战略。黑豹党人并没有为了改变社会发展武装斗争，他们选择了与其组织起来的民

众紧密团结的方式。与之相反，“地下气象人”组织⁵开展的武装革命使他们在人民中孤立、在政治上落后于时代。

尽管黑豹党人坚持的自卫权被许多美国公民认为是正当权利，但他们还是受到了镇压。他们对于武装自卫权的坚持给了联邦政府一个用来镇压他们的借口，而这个借口正是政府用来镇压对手所需要的。

现在运动可以被有效地压制。



政府也想镇压采取非暴力行动的黑人自由团体，比如，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就千方百计想要消除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民众中的影响。但是事实上，政府对于非暴力组织所能采取的行动非常有限。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一再派间谍加入非暴力运动，并想方设法煽动暴力的原因。政府需要运动转向暴力，以便有效地镇压。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暴力斗争的确需要非暴力行动的保护。

当黑豹党人想在费城举办一场全国性会议时，他们找不到会场。基督教“联谊会”把自己的大型会议室提供给黑豹党作为会场。费城的警察局长弗兰克·里佐想利用这个机会恐吓威胁黑豹党，于是，基督教“联谊会”成员肩并肩围成一圈，保护黑豹党的会场。

这种情况在1986年菲律宾人民推翻独裁者费迪南多·马科斯时再度出现。在斗争的最后阶段，拉莫将军领导的一部分军队站到了人民一边。此时，马科斯仍旧控制着大部分军队，他命令军队攻击拉莫的营地以平息叛乱。当广播电台响起“人民力量运动”发出的呼吁时，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冲上街头，保护起义的士兵。

非暴力行动专属于白人吗？

这种说法会让一个多世纪以来千千万万使用过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美国有色人种活动家感到莫名其妙。早在1876年，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的非裔美国人就在电车上开展抵制种族隔离的“自由乘车”行动。这只是成千上万个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案例之一。在美国各地，每个星期都有社区组织草根的有色人种团体进行非暴力行动：游行、静坐、封锁街道、抵制、公民不服从，等等。需要写很书本才能写尽医院工人、旅店服务员和看门人等等参与罢工和使用其他战术的故事。

⁵ 是美国的一个极左翼组织，1969年由反越战组织民主社会学生会中的激进派分裂出来，认为，只有将战争带到美国本土，才能让美国人知识自己的政府在国外犯下的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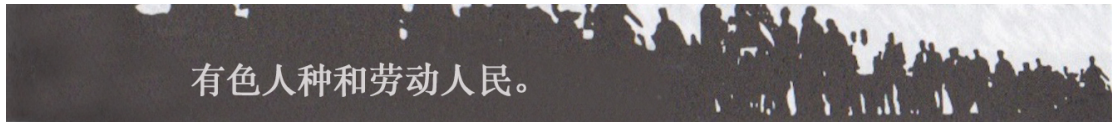
或许这就是为何非暴力会被对镇压行动
有深刻了解的团体运用的原因……



在美国，参与非暴力行动的有色人种比例远远高于白人，这一状态仍在继续。这还没有计算非暴力在非洲和亚洲反殖民斗争中承担的角色。当我们想到非暴力时，为什么总会想到甘地、马丁·路德·金、昂山素季、凯撒·查维斯等人的名字？因为他们在冰山的顶端。

大众传媒和学校都试图美化暴力来给我们洗脑。是否传播有关人民力量的信息取决于活动家自己。有多少活动家知道：1950年代，夸梅·恩克鲁玛在加纳领导的一次成功的非暴力独立运动？1960年代，肯尼思·卡翁达在赞比亚领导的另一次成功的非暴力独立运动？1980年代早期，南非国民大会党从暴力转向以非暴力行动为主，最终结束了种族隔离政权？1990年代，获得民主运动成功之前的台湾，长期反抗酷刑、杀戮和大范围伤害的非暴力民主运动？同样是1990年代，加拿大魁北克莫霍克人英勇斗争，拯救祖先的土地免于成为白人的高尔夫球场的非暴力行动？仅仅几年前，尼泊尔学生成功开展的争取民主的非暴力斗争？

我不想从非暴力行动天然属于中产阶级的说法开始谈——这比非暴力只属于白人的说法流传更广。从事非暴力行动的劳工阶级人口比例远高于中产阶级，因为工会已经是阶级斗争的“突击部队”，阅读他们的历史就是在阅读美国非暴力行动的大部分历史。



有色人种和劳动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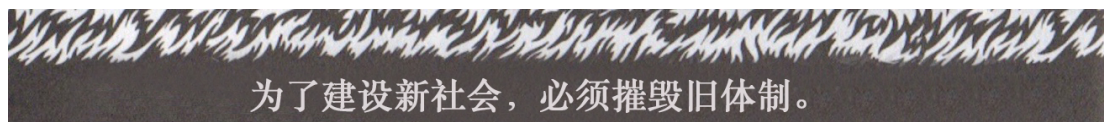
白人从事低风险的工作，有色人种从事高风险的工作，这难道不是种族主义吗？

沃德·丘吉尔低估了传统上称之为“预备工作”——为发动街头运动而进行的动员、组织、计划、分析等——的价值：为社会提供替代性方案，使新社会从旧社会孕育而出。不仅如此，他还认为，白人总是在做低风险的提供替代性方案，却让有色人种承担高风险的走上街头。

显然，沃德·丘吉尔贬低了提供替代性方案对有色人种社区的重要性。比如，早在“伊斯兰国民族运动”⁶通过提供替代性方案占据媒体头条之前，非裔美国人已经开始重建自己的文化。对于一些有色人种运动领袖来说，替代性机制是势在必行的实用策略。

⁶ 是非裔美国人的新宗教伊斯兰主义组织。1930年7月由华莱士·默罕默德于底特律成立。该组织主张反对白人、反对犹太人和黑人优越主义，要求成员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

举例说明，甘地通过对印度人民被英国殖民者镇压后处境的分析，看到了压迫被内化的迹象：对殖民者的依赖、对妇女的压迫、滥用药物、酗酒、沉迷英国货、缺乏自尊。甘地厌恶权威主义，不想投入一场棕色人种的专制替代白人的专制斗争。于是，他发起了他称之为“建设性方案”：通过促进身心健康和建立平行政府，增强印度人自身的力量。“建设性方案”也是甘地反对种族主义的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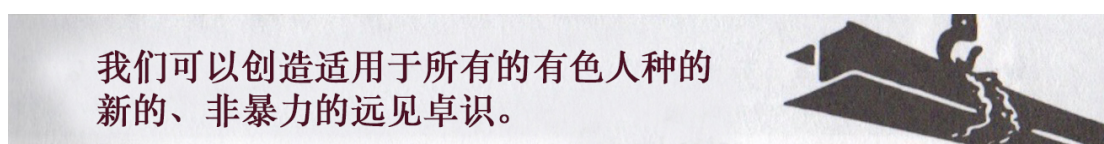
“预备工作”会占据直接行动的时间吗？当然会。印度国大党每隔10年发起一场全国性运动，同时，他们花大量时间在本地从事“预备工作”。由于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战略是从多条战线向对手挑战，而不仅仅是开展街头斗争。所以当他们真正走上街头的时刻，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不是只凭愤怒行动的乌合之众。

美国劳工和平权运动活动家凯撒·查维斯意识到，以前只在加利福尼亚组织农场工人的行动是失败的，必须首先设计出一套包括合作共建和替代机构在内的新战略。他深深体会到，受到深重压迫的农场工人在反抗之前，需要建立成熟的组织并增强斗争的能力。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甘地和凯撒·查维斯都有与进行游击斗争的越南自由战士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一样的常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先要摧毁一个旧社会。美国的活动人士在为争取解放建立一个实用战略的时候，也需要严肃地考虑这一问题。

身为一个白人，我要说，白人非常需要一种健康的方式来替代傲慢和种族主义。身为一个同性恋男人，我要说，社会对同性恋的嫌恶伤害到我的同类，削弱了变革可用的力量。这些问题在有色人种和白人那里同样存在。身为一个工人阶级家庭背景的人，我挑战中产阶级和有产阶级活动家的阶级歧视，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更加脚踏实地、持续、有效的运动。

因此，我强烈反对沃德·丘吉尔的这些观点。除非我们只是想让不同的人成为压迫阶级，否则，有色人种和白人都需要一个新的社会。



一个务实的活动家是否应该始终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所有的战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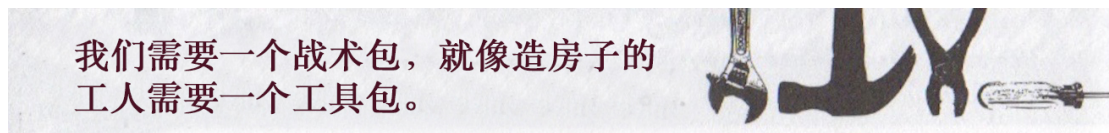
沃德·丘吉尔特别担忧的是，活动家会武断地排除某些战术。他说，如果我们要实现一个目标，比如革命，我们就不能排除任何战术。我们要对所有的战术保持开放，从请愿到公民不服从，从街头抗议到战争——任何手段。

当我思考我的战术时，沃德·丘吉尔的建议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如果我正在盖房子，为什么不准备一个最大的工具包呢？

但当我开始考虑战术时，沃德·丘吉尔的建议并没有出现。举个例子，二战中的丹麦人民没有料到纳粹会入侵自己的国家，因此，他们没有最好抵抗的准备，当入侵发生时，他们只能尽最大地努力即兴发挥。在一次高风险的斗争中，他们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战术。开始时，他们的战术范围从合作到请愿，再到破坏，这些方法都没有起作用，因为这些战术互相抵消了。于是，丹麦人尝试另一套战术体系：破坏、非暴力集会和罢工。这些战术再一次发生冲突，每次破坏都给了纳粹镇压工人和集会者的新理由。

那么，丹麦人民在反抗纳粹的战争中是什么真正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地下出版物、大规模罢工（包括总罢工）、非暴力集会，帮助犹太人逃到安全的地方——瑞典等等。

战略要有内在联系，战术之间要互相支持而不是互相冲突。



这里有一个与造房子类似的例子。一小组美国活动人士通过一个有效的运动策略，破坏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政府曾经支持一个屠杀了成千上万东孟加拉人的巴基斯坦军事独裁政府——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政府总是支持这样的政府——但美国政府否认他们对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当巴基斯坦的货船驶入美国装运准备用来继续屠杀的武器装备时，一些美国活动人士得知了这个消息。他们希望能说服码头工人拒绝装运武器，以挫败政府的计划。

问题在于，东海岸码头工人在政治上倾向于政府，而且需要养家糊口。活动人士在反复劝说码头工人与他们一起抵制，但没有取得成功。于是，活动人士决定采取直接行动。他们宣布，在下一艘巴基斯坦货船到达码头之前封锁港口，用帆船、小划艇和其他船只进行“海军演习”。媒体对这次行动给予了持续报道。码头工人看到一群举止奇怪的抗议者，这些抗议者似乎相信可以用小艇阻止一艘巨型货轮。这一战术吸引了码头工人的注意，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如果活动人士能够封锁港口，使货船无法到达码头，码头工人就不会穿越封锁给货船装货。

当运动在一个城市取得成功后，活动人士又在其他港口城市复制这一行动，最终码头工人

工会同意不帮助巴基斯坦货船装运武器。由一小组活动人士发起的封锁获得了成功，因为他们采取了直接行动的战术影响更多的群众。

用暴力创建一个公正的社会，就如同用喷灯
建造一座小木屋。



如果这些活动人士决定在码头上破坏装运的货物，行动可能会失败。因为这样的行动不会得到码头工人的支持，而码头工人是运动获得成功的主要同盟。如果运动发起者容忍包括破坏货物在内的“多样性战术”，将是不负责任的。今天，在反对全球化的运动中，有些活动家为了容忍其他成员的意见而放弃了有效性。如果你真得在意海龟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穷人，你将很难为你的选择辩护。

对所有可能性开放的“多样性战术”，就像建一座没有设计图的房子，一栋房子包括太阳能电池板、烧木柴的壁炉、烧天然气的锅炉、护壁板电热系统、落地窗、隔热石棉、卧室按摩器、简朴的冥想室，等等。建房子必须在整体概念指导下进行设计。这是建一栋房子或开展一场运动的共同之处。

“非暴力革命”在词义上是否自相矛盾？

沃德·丘吉尔质疑一个人既是革命者，同时又是非暴力行动者的可能性。他认为，非暴力行动者基本上是改良主义者，而革命需要使用暴力。媒体上的报道证实了他的质疑，我们只能在报纸上读到非暴力行动迫使政策改变以及其他的改革，我们很少看到非暴力行动导致革命性变化。但我不同意这一观点。

1968年春天，法国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革命行动，几乎推翻了政府，这是近期发生的最接近我们讨论的案例，因为它发生在被称为“先进工业自由民主”的国家。



使用暴力的活动家要不断地破坏，直至
对手放弃。

1968年5月，巴黎学生发起了一个教育改革的斗争，学生们占领了大学校园并在街头组织集会。警察进行了残忍的镇压，学生被打伤的消息迅速传开。法国劳工联盟决定举行罢工，工人支持学生是因为他们也有对政府不满的理由。很快，约1100万工人开始了罢工，他们占领了工厂。占领行动使用的战术是：工人占领巨大的自动化工厂，掘墓人占领墓地，舞者占领游乐厅。

斗争在深入，在工人和学生之间，要求改良转向了要求革命。一些城镇切断了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并开始自己印刷货币。戴高乐总统对驻扎在法国本土的军队不太信任，所以只能要求驻扎在德国的法国军队回国对运动进行镇压。学生和工人站在一边，富人站在另一边，中产阶级面临选择：他们该怎么办？他们中许多人是学生的家长和朋友，警察的残酷镇压激怒了他们，因此，他们愿意站在学生一边。

国家控制的电视台一遍一遍播放学生打砸抢的场面，比如，把小汽车推到十字街头点燃以设置路障——这不但让中产阶级感到震惊，更让那些需要辛苦攒几年钱才能买一辆车的工人触目惊心。

中产阶级还面临一个问题：一旦国家政权被推翻，新的社会有合适的替代者吗？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革命无法消除这种疑虑。中产阶级只能坐在家，恐怖地看着电视上燃烧的画面。

这样的战略能使我们的运动获得成功吗？



我们知道后来的结果是运动失败了，虽然也导致了一些改革措施，但大资本家和政府胜利了。美国的活动家必须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学生失去了最初支持他们成功的盟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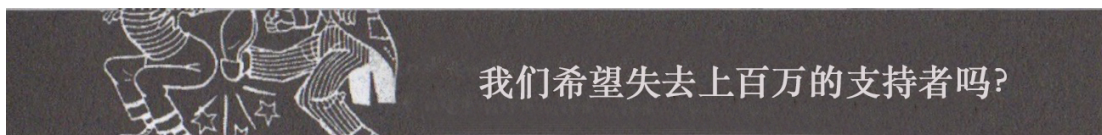
对这个案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我的书中找到许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学生依照传统的“革命等于暴力或等于破坏”的模式开展运动，他们不了解革命的真正含义。

学生不懂得如何建造法兰西这座“房子”，他们的政治目的是争取人民的支持，只有人民加入日渐高涨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运动才会取得胜利。在1968年，还没有伊朗统治者巴列维、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东欧专制体制倒台的经验可借鉴，因此，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比暴力斗争更强有力的是人民的力量。

如果活动人士不能从这个案例中汲取教训，法国学生和工人的代价就白白付出了。非暴力行动比暴力更有强制力，但强制的基础不同，暴力的强制力量在于它的破坏性，传统的破坏方式是摧毁对方的军队，现在也包括其他形式的破坏。使用暴力的活动家要不断破坏，直至对手放弃或丧失坚持下去的能力。

与此相反，非暴力行动的强制力量则来源于人民的不合作。对手的统治依赖人民的合作。如果人民拒绝合作，哪怕是伊朗统治者巴列维，哪怕是萨尔瓦多独裁者埃尔南德斯·马丁内兹也只能逃亡——在这些案例中统治者投降了，在另一些案例中政权消解了——比如东德。

假如法国学生明白他们胜利的真正机会在于人民的力量，他们就不会进行打砸抢——这种战术更适合暴力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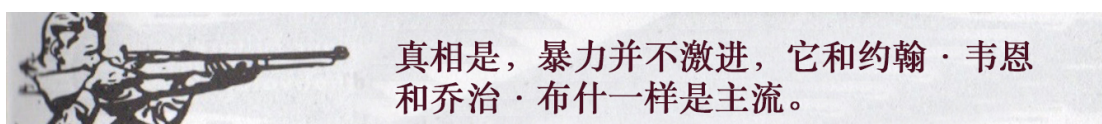


缺乏战略的实用主义革命家如何在暴力和非暴力行动之间做出选择？

严格地说，这种选择是不可能的。没有不同的战略做比较，一位坚持实用主义的活动家会很难抉择。有时候人们会将暴力等同于“革命”或者“激进”。然而，许多时候暴力是为了改革，而不是为了革命。思考一下这个例子：如果卡车司机在一次罢工中向长途客车射击，他们是要使用暴力打破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工人阶级所有制吗？如果白人私自处死黑人，他们的目的是把黑人送回非洲（革命性的改变），或者只是让黑人安份守己（观点的改革）？

暴力不是革命或者激进的标志，因为它一直被用于多种目的，包括用于自我表达。一场革命是不是暴力的，取决于在运动的战略中，暴力是不是被用来实现彻底的社会变革。而21世纪美国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者，一个理性的，不掺杂道德感情的革命实践家会在使用暴力和使用非暴力的战略之间作比较，看一看到底哪种战略会更好地实现新社会的愿景。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活动家才能够讨论不同的暴力和非暴力战略。



在战略还没有产生之前，我们如何选择？

即使是我们中间最现实的人，在没有战略的情况下也无法做出有效的现实选择。如果没有战略，我们就必须做出一些不那么现实的选择——依据个人偏好进行选择。以下是我的个人选择。

身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和一名男同性恋者，我对我所遭受的一切感到愤怒！我无法计算有多少次我被称为“垃圾”，“暴力的”、“没文化的”、“懒惰的”“性魔”，“恋童癖”，“肮脏的”、“娘娘腔的”、“不道德的”“怪物”等等。尽管进行了数年的内省，用各种方法治疗心理创伤，我仍旧背负着自我怀疑，就像每天背负着沙袋一样。

虽然我并没有受到严重的身体攻击，但我受到了歧视。我目睹朋友将外在的压迫内化，做出自毁的可怕事情；我看到一些运动团体成员因为自己所受的迫害而攻击团体的领导者，导致团体不能有效的开展行动；我同情那些因不敢出柜而自责的朋友，因为他们的自责毫无必要；我为那些因为自己的身份而社会忽视的人感到难过。

这些年受挫的经历让我更加愿意用暴力进行自我表达。虽然我有时会私下对朋友表达不满，但我更愿意公开表达愤怒，大声说：“去你妈的”！

因为上述原因，我选择了非暴力战略。这一选择像是一个锚，每当我迷失在自我烦恼的迷雾中时，它会将我拉回到现实中来，让我镇定下来，继续寻找新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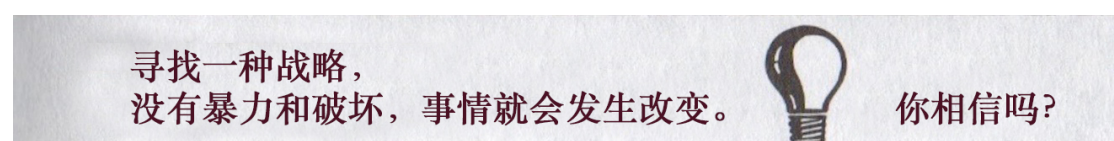


这个方法通常很有用。在一次午夜时分，当我被敌对团伙包围在废弃的城市街道时，我用非暴力的方法拯救了自己。当一个暴怒的年轻人拿着刀要捅我时，我用非暴力的方法使我们双方免于毁灭。当警察打我，右翼分子伏击我的时候，我用非暴力的方法让他们停手——我还可以继续举例，但你们明白我想说什么。当我志愿前往斯里兰卡作为一名非暴力的保镖保护处于刺杀威胁中的人权活动人士时，一位好友恳求我接受他给我的礼物——一把枪和弹夹，我拒绝了。我确信，在对抗的时刻我会找到更好、更安全的方法。

我个人的偏好是暴力，我选择的方法就是用非暴力之锚可弥补我的暴力偏好。

另一种可选方法是警惕文化偏见，为文化塑造我们的方式承担责任。我是一个男人，文化对于男人的要求很清楚。约翰·韦恩、乔治·布什、毛泽东，以及通常的男性统治者相信什么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对权力的信仰是整个文化的统治模式——弱肉强食。

活动家斯塔霍克的权力理论比父权制下过分简单的权力理论更吸引人。她描述了三种类型的权力：过度权力（统治权，更多通过杀戮进行戏剧性地表达）、适当权力（与他人合作，团队工作）、内生权力（心理和精神力量）。我们从小就相信第一种权力是最强大的力量。当需要最强大的力量时，我们会毫不迟疑地选择暴力。



人类最美好的品德是，我们有时会做一些超越文化的事情，甚至会做一些远远超越文化想象的事情。印度殖民地西北边境的阿卜杜勒·可汗是在游牧文化中成长的，他比我更沉浸在枪和暴力带给男人尊严的想象之中。但他打破文化为他设置的行为模式，组织个性激烈的帕坦族人进行反抗英国人的非暴力斗争。英国人用比对待其他运动者更残酷的方式镇压帕坦族人，但帕坦族人很坚定，而且纪律严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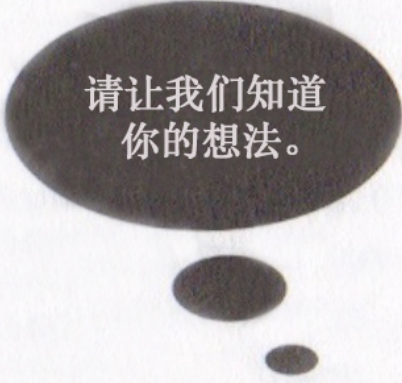
我的文化告诉我：“一个真正的男人必须使用暴力。”但我选择了不合作。父权制在我这里失去了作用。我用自己的身份认同阻止父权制对我的影响，我用非暴力战略挑战父权。

我花了5年时间写作了《活的革命策略》一书。这本书是一个务实的框架，试图在美国创造一个具体的革命战略。我希望不久的将来，不同的战略之间可以互相辩论、交流。我相信，参与到非暴力斗争中，与同事共同学习和创造，是最适合我的方式。



注释

略



请让我们知道
你的想法。

我们的网站是：
www.TtrainingForcChange.org



作者简介

乔治·莱基，1937年出生。他的培训师生涯开始于社会变革的马丁·路德·金学校。多年来，他在五大洲举办了超过1000场工作坊。他曾经为矿工、心理咨询师、流浪汉、监狱囚犯、俄罗斯同性恋、斯里兰卡和尚、缅甸游击队员、南非活动家和其他许多人做过培训。他还是一名社会学家，曾经在大学和研究院教课，出版过6本书。他担任美国费城一家非营利组织“变革培训”机构的执行主任，该机构为全世界的非暴力民主促进团体提供支持。

当暴力
与
非暴力
相遇
会怎么样？

